

朱光烈

不会左右迂迴
你就划不出优美的圆
不会上蹿下跳
你就翻不过陡峭的山
只消一句话
你可以道破古往今来的秘密
却是千言万语
说不出自己脚下的辛酸
你的路最长
尽管你的距离最短

现代文化批判与 新现代化道路

有了朝阳夕月
你会欣赏到优美的圆
有了凌云之志
何愁飞不上碧蓝的天
只消一句话
魔鬼说过现代人几乎全无灵魂
却是千言万语
说不尽精神世界的灿烂
你的路最长
苦恋的道路不应最短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大梦未归

自序：

我特别怕写书。平时为文，大都心血来潮，信笔由之。因为是文章，或许这样写还可以，写书，特别是写专著，恐怕就不能这样随便了。前年我写了一本电视对儿童影响的书，十三、四万字，先是抄卡片、作笔记就有二十来万字，书写成后还不象样。于是我更怕写书了。怕写书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功力不够，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没钱出书。我从事编辑、科研已经快八年了，期间申请过一次科研立项，获资助两千大毛，以后再也不敢问鼎。有些同志请有钱的单位赞助出书，是个好办法，可我总是开不了这个口。前天，一位多年没见的同窗老友表示乐于资助我出本书，我本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出书了，同窗的相助使我大喜过望。但是我仍然怕写书。于是我便翻出了几年来已经发表的论文选了选，排了排队，竟得30多篇，约30万字之多，觉得可

以结集出版。现在已经大致整理就绪。往年文稿有的观点我现在已经明显改变(这点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出来),还有幼稚可笑之处,但我并不想修改,即是文字也不想再行加工润色,一如原貌。这是我的历史。整理这些旧稿,刹那间时间倒流了。七八年来,我的正业是办刊物,其间也写些随心所欲的文章,现在整理它们,往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都从那些依然还能散发着当年油墨味的铅印文稿里重新涌现了出来。我从哪里说起呢?还是懒办法,以去年暑假写的一篇文章《大梦未归》(尚未发表)作为这本书的开头话吧。

朱光烈,1994年3月21日于北京广播学院寓中

大 梦 未 归

也许应当从这里说起

大概是1980年,报上第一次报道特异功能——唐字耳朵认字——的时候,周围的人为之哗然,许多人以为这根本不可能,但是我却与别人辩论,认为没有理由否定它。当时我想起了毛泽东大概在《实践论》里的一句话,科学还处在青年时期,我不能证实耳朵认字现象的存在,但是我也不赞成以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看法,因为人们没有理由去否定它。以后这类报道多了,听到这类报道我发自内心的喜悦,有时简直欣喜若狂,逢人便说。我有一种愿望,希望它是真的,希望有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存在。经过多年的研究,我相信我们面临的世界如同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一样,具有不可穷尽的侧面和层次,人类只是看到了它稀少的侧面和表浅的层次,人类正面临着一场重新认识世界的伟大革命,我们不可盲目地否认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我对探索未知领域有一种强烈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禀性支撑着我的学术活动,左右着我的编辑工作。

写出自己来

1986年以前我搞了十几年的机关工作，那么长时间的工作总觉得不太舒展，上司也不太喜欢我，现在回想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是我爱发点怪论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机关工作更需要顺从。1986年转到主编学术刊物，同时搞些科研，这个新的工作使我在业务方面比以前舒展多了，而且有点渐入佳境之感，看书看报，与人聊天，听广播，看电视，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选题随时随地地迸发了出来，可以说我有写不完的题目，写起来也还比较快，现在有些文稿不再起草，一遍写成，稍作修改即可付印，我写的东西，大致说来都还有些新意。在这新的环境里，发怪论的老毛病不仅没有改，而且愈发发展了。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认为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不分主次综合把握声画关系的主张。我1991年撰文认为必须在比较研究的层次上肯定电视传播以语言为主导的观点，并且做了多侧面多层次的辨析。关于广播的优势，一般只是分析迅速方便的外在优势，我撰文着重分析了它的解读空间巨大的内在优势。关于新闻工作者，广播电视工作者的素质，一般只分析政治、作风、理论、知识、业务技巧等诸方面，我去年发表《求通》着重分析文化素养对于提高业务能力、发挥创造性的根本的、活通的意义。去年以来广播业务改革影响巨大，但是理论界的研究却缺乏新意、缺乏纵揽全局的力度，我撰写的《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一文从中发现了中国新闻改革的一条传播学道路，并以国外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为参照系做出了较系统的、深入的理论阐述。在《论“全息文化”——市场经济过程中大众传播文化的选择》一文里，我独立提出了现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全息文化”构想并且批评了过了时的、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提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就是力量”的新口号。多年来，我主要精力放在对大众文化、电视文化的负面影响研究上，许多观点都是有悖于广播电视流行观点。我不是教师出身，我很少讲课，偶尔为之也都是讲我的研究成果。我讲的都是理论，爱听者寥寥，但是每次还总是有少数人感兴趣。因为都是讲我的成果，自然怪论就多，有一次一位听课的编辑问我还有哪些“独树一帜”的观点。我的观点或许不都对，但它们确实都是我自己的，都是从我心里流出来而后结成的血花。我以为做学问要做出个性来，写出自

己来，不管是我的那些行为还是我的那些观点，至今我都不悔。

不务正业

在我看来，学问之道是博通之道。古人做学问走的是博通之道，今人更应当走这条治学之道。现代社会高度分化，行业和学科多如牛毛。本来，世界是统一的，但是现代社会却把它分割得鸡零狗碎。人们往往囿于各自领域里的事务，很难对世界有一个全面认识，很难做成大的学问，真正的学问都具有博通的特征，都走着博通之路。现代社会的分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整个社会都在走上大综合，而且这种趋势还仅仅是个开头。一个行业、一门学科要有大的发展，不与别的行业、别的学科综合断无可能，甚至于人类的命运也全系于整个人类社会大综合的发展。长期以来国内外有一种看法，认为新闻和广播电视只有“术”而没有学，“五四”时代的北大教授们认为培养新闻记者如同鞋匠学徒一样，坚决反对新闻教学进入大学课堂。当时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老大学的老专业，具有上千年的历史，至少也有数百年的历史；新闻，特别是广播电视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从学科积累方面看，劣势十分明显。但是我仍然乐于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我相信，只要走博通之路，广播电视的研究也可以走进学问的大雅之堂。首先，我历来主张广播电视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传播学的基础上。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大众传播事业诞生了，普及了，相应的，传播学诞生了，而传播学正是借助于对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统计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发展起来的。其次，我们的眼界还要大大扩大，超越传播学。我相信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互相包容的，根据混沌学，北京的一只蝴蝶鼓动翅膀可以使几天后纽约的一场大暴雨为之改观。因此我有些“不务正业”，我看广播电视方面的书刊不太多，但是对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感兴趣，特别是对于系统科学、文化学、东西方哲学甚至于东方神秘主义感兴趣。我有一种了解世界本源和终极价值的强烈愿望，为此我阅读了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著作，我发现现代物理学在对世界本源的了解方面，在方法论方面，与东方神秘主义、东方哲学非常一致，而东方哲学的辩证法非常深刻，超过了西方哲学，它的非理性部分尤其值得现

代人的重视。所有这些学科我都没有很系统的学习过,没有一门我够得上专家级水平,但是正是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不,我的记忆力不好,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大都遗忘了,正是这些知识被遗忘后的文化——积极的价值取向和灵活的思维方式,给我带来了活力,我一直很相信中国的一幅古老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它给我带来了不断涌现的思路、选题和资料,永不枯竭,写也写不完。我具有排解不掉的社会责任感,对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总是忧心忡忡,从我转入广播电视研究和办广播电视学术刊物的第二年起就在如何克服这种影响方面做文章,一直到今天坚持不懈,可以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收入本书的《风范·气度·生存状态》是我多年来坚持这种治学态度的最新体验,而《现代文化批判与新现代化道路》则是我这种治学态度的最新成果,在后一篇里,我独立提出了对世界新时代的分析和发展中国家应走新的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思想。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虽然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传播学的研究,但是现在正在走向泯灭传播学研究自身的道路,我这种治学态度也存在着同样危险。但是我相信,学问正需要不同的侧面去建构。

追 新

我曾经担任过《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的主编,现在我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副主编,领导信任,实际上主持全面工作。

学术刊物是科研成果的发表园地。科学研究就其本质来说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它的最高价值应当是对未来的科学预测,因此,学术刊物用稿标准当以“新”字打头,新观点,新视角,新观念,新思路以至于新材料。这种指导思想我们始终很明确,抓住不放,着力加以突出。1987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我国广播界率先大规模改革,从内容到形式按照听众的需要办广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我当时主编《新闻广播电视研究》,我在该刊1988年第1期上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集中发表了关于这家电台改革的研究稿件,在社会上获得好评。1993年年初北京地区出现了一股电视纪录片纪实风格的研究热潮,这种研究是对前一两年纪录片过分强调灌输和教育的反弹,开头我们发表了十来篇稿件全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但是

这些研究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有跟拍和同期声才可以真实地纪录生活,才是纪录片的唯一正途。到了3月份,有的研究者提出纪实不是真实的观点,认为纪实和表现都只是一种美学手法,我们立即约了这篇稿件,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这篇稿件的发表把纪录片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当年初冬我们又发了两篇纪录片应当重点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中普通人的生活,把对风格的讨论转向了关于题材的讨论。纪录片是一个电视台水平的主要标志。1993年我们抓住了关于纪录片的研究热潮,不惜版面,一共发了25篇稿件。这一系列的稿件不仅完整地反映了去年我国关于纪录片研究的轨迹,而且在研究方向和观念上引导了这场研究。1993年年底以来,各电台普遍采用电话参与直播,使广播的影响戏剧性的扩大了起来。但是《学报》总是见不到有份量的研究文章,其他刊物也没有发出有份量的稿件。4月份我连续4次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各系列台,实地考察了电话参与,写了一篇题为《秘密武器的发现和二次浪潮的掀起》,在社会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发现听众电话参与是广播的神秘武器,报刊、电视难以利用这个利器。同时第一次把电话参与与1987年珠江台的改革联系了起来,认为珠江台的改革是第一次浪潮,大规模的听众电话参与是第二次浪潮。之后我又南下宁、沪实地考察电话参与,回来后我在《学报》第3期上发了6篇稿件研究这一改革浪潮,其中有我个人写的文章,提出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正由“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过渡的理论分析,并且指出这种过渡是中国新闻改革一条较为成功的较为稳妥的道路。我还为这期《学报》撰写了一篇《主编札记》,建议作者、读者开展对这条道路的讨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全国首次提出的。

综合与拓宽

1986年我转入主编广播电视学术刊物之初,第一件事是起草了一个报告,撰写了一篇论文,建议聘请一批广播电视界、新闻界实际工作者和一批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对广播电视实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第二件事是又写了一篇《关于广播电视的综合研究》论文,从现代思维方式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上述思想。1991年初调任现职,第一件事写了一封给作者、读者

• 6 •

的信,在讲到办刊思想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广泛吸收有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当时我列出了十来种学科。去年开始,我在《学报》上辟了一个《有关学科评介》栏目,向读者评介了许多学科,把广播电视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大众文化、传播学、国际文化交流甚至于方法论等方面,我们的许多稿件广泛地吸收了有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今年第一期《学报》的《主编札记》里,我向读者汇报了去年的编辑工作,其中第一条讲的仍然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和拓宽领域。多学科综合研究,一直是我办学术刊物全过程中非常强调的指导思想,构成了我办刊思想的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发了一批理论品位较高的论文,光1993年头四期就有:《论电视纪录美学》(胡智锋)、《重返社会:复归人类情感联系》(刘敬东)、《论“全息文化”》(朱光烈)、《后现代主义:价值失陷的人文景观》(刘春)、《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朱光烈)、《价值选择的迷乱》(胡智锋)、《文化断裂中的话语尴尬》(刘春)、《商业广告、消费文化与社会宣传》(孙振斌)、《论儿童的媒介需要与媒介选择》(卜卫)、《〈德兴坊〉的女性视角》(刘春)、《学人与学问》(刘春)等,其中《论电视纪录美学》和《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被《新华文摘》摘发。1994年第1期我的《现代文化批判与新现代化道路》其研究领域更为宽广。这些论文有的对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有的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系统的理论阐述,有的对重要的电视理论提出了超越前人的深刻的理论阐述,有的对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的对治学问题发表了富有文彩和力度的见解,有的对大众传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理论说明,所有这些都引进了传播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等有关学科研究的成果。在我看来,一家刊物如同一个人一样,如果眼界过窄,就什么研究什么,就新闻研究新闻,就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恐怕就难以超越经验层次,“术”的层次,难以有较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功夫在诗外”,能否超越研究对象,是能否办好学术刊物的关键所在。

文化与灵动

我们的《学报》这两年开了《文化人物访谈录》栏目,最初设想是想把

广播电视界以外的文化精英人物介绍给读者,通过介绍人物介绍有关领域里的信息和追求,有关学科的某些鲜活的信息。但这些人往往很忙,往往无暇著文,我们就派人采访,然后写成访谈录发表。我们还开了一个《随笔》栏目,是想活跃一下刊物的气氛,《随笔》为文短小,有文彩,又要追求理论深度。曾经有的关心《学报》的人士给我们提意见说,这些稿件不象论文,使《学报》有些不太象学报了,因为别的学报并无此种文体。我以为文章的价值体现在新鲜、深刻上,一般说来,形式应当服从于内容,《学报》用稿在形式上不宜定于一尊,不然就会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实际上更多的读者反映,由于开了这类栏目把《学报》办活了。

选稿有时是凭感觉的。1992年广播学院请了前苏联电影艺术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导演罗斯托茨基作报告。他结合一生的艺术实践主要讲了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这次报告我没有去听,当晚一位作者对我讲了情况,我们都很激动,我马上请他写一篇讲演录。第二天见到了主持报告会的一位副院长,告诉了他我们的计划,他也很激动,他谈到了报告会上有人退场,有些人一个劲儿地追问具体业务问题,以为这些人不懂得大师演说的深刻含义和宝贵的精神。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各方好评。

可以说,由于当前世风浮躁,这种献身艺术的精神极可宝贵。在具体组织稿件时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但是刚一接触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直感就感觉到它的价值了,抓住不放。

我看来稿经常会有一些联想,有些联想我把它写成“编者按”、“编后话”,后来受到《读书》杂志《编辑室日志》启发,还开了一个《主编札记》小栏目,编后许多想写的话,或者借题发挥,或者深入挖掘,或者点出整期《学报》精华,或者提倡什么,等等,都在这些短小的篇章里自由抒发。今年七月我看到一位记者的来稿。写采访时如何提问,其中写到他有两次成功的采访。一次是采访一位市长,该市长创造了一种叫做“达标入档”的管理方法,很有成效。别人采访他,他总是给一份总结材料了事,这位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问“你是怎样想起制订这样一种方法的”,市长和他谈了两个小时。还有一次采访民族歌唱家蒋大为,开始蒋也表示不想接受采访,记者问蒋“这几年民族唱法受到通俗唱法的冲击很大,有关情况和您的看

法请您谈一谈”。结果蒋大为和这位记者谈了一个晚上。如何提问的问题是采访中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了解,可惜的是来稿对于为什么这两位被采访者乐于接受他的采访分析不深,看完稿子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对他提供的材料进行分析,认为他的成功秘密在于他的问题正好撞击到了采访对象的情感兴奋点上了。并进一步论述与采访对象情感交融是成功采访的润滑剂。很快这位记者回了信,表示同意我的分析,并感慨地说,他搞了半辈子采访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已将我的那封信作为“学术通讯”和这位记者来稿同时发表。

“学院派”特色

经过多年的努力,相对于其他广播电视学术刊物,我们《学报》具有了被称为“学院派”的特色,这种特色大致可归纳如下:(一)以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研究的专业基础;(二)拓宽研究领域,多学科综合研究,理论层次较高;(三)理论联系实际,抓住重大现实问题,集中力量,形成“拳头产品”,使刊物较有新意和理论冲击力;(四)追求文化品位,着力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对读者有所启发,给读者的不是现成的“金子”,而是可以点石成金的“吕洞宾的手指头”。

编辑是什么?

根据我的经验,当一名《学报》主编,应当有强烈的探索新世界的意识,应当有强烈的理论意识,应当有开阔的眼界和博通的追求。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光有这些远远不够,主编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探索精神,理论意识,博通的追求,与文化素养是一致的,但是文化素养的内涵也许更为丰富。

编辑是什么?传播学把编辑叫做“把关人”,他是信息能否进入传播通道送到受众那里的决定者。信息社会的出现使“编辑工作是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说法已经过时,它是信息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信息产业得以运转的工作,编辑在信息运转过程中处在核心地位,关系极其重大,必须具有高度的鉴别能力、发现能力,而这一些都是创造能力的外化。没有这种

条件，“把关人”的编辑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而鉴别能力、发现能力和创造力量是建立在高度的文化素养的基础上的。

什么是文化素养？

我在那篇《求通》一文里指出，经验虽然必要，但是意义很有限；理论更有必要，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它又很容易形成人们的“所知障”，成为自我设限的系统，成为发挥创造性的障碍。靠什么破除“所知障”，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主要靠高度的文化素养。文化素养和知识的获取分不开，首先要有一个渊博而大致均衡的知识结构才可能形成较高的文化素养。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人们获取多种多样的知识之后必须进入深入的消化过程，通过消化把隐藏在知识后面的价值观念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吸收到自己的血液里，储存在自己的显意识和潜意识里。在这里面首要的是高尚的、为人类献身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一种驱动力，它可以把一个人从事的事业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整合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往往与这种价值观的树立分不开。这正是为什么成大事業者往往首先强调做人的缘由。高尚的价值观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是知识本身，一般地说，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法国一位作家说过，文化是知识被遗忘后的遗留。我们常常可能看到，有的人学富五车，但是却较少有创造，甚至于反倒墨守成规，原因在于他缺少一种东西，这就是文化素养。书读得很多了，但是知识后面的文化他没有发现，没有掌握，没有进而用各种知识去构筑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素养是一个神秘的系统。技巧、经验、理论甚至于那些可以说得清道得白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好象只是构成文化素养系统的“硬件”，一些初始材料，光有这些“硬件”文化素养这个系统还很难合成，很难有效地运转起来；文化素养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灵，这是一种批判能力和统摄能力，它好比润滑油，有了它知识和经验的各种“硬件”才可能运转起来；它又好比催化剂，有了它知识和经验的各种“硬件”才可能发生“核聚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出新的元素。爱因斯坦创造的相对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它使科学家第一次跳出了经验世界，极大地开阔了人类的眼界。在

多人,包括大批大科学家对爱因斯坦的创造性不能理解,他们仍然陷在只承认“观察量”的经验科学的自我设限系统之中。针对种种误解,爱因斯坦明确申明他反对认为只有“观察量”才可以进入物理学的想法,他的相对论正是对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超越之后创造的。爱因斯坦不但在物理学方面,而且在教育学、在哲学以至于在艺术上都有极高的修养和造诣。在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里是没有隔绝的。按照爱因斯坦自己的说法,他对世界的研究是一个“生命体验过程”,他不相信上帝,但是曾经说过:“我没能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做学问,写文章,办刊物,要做出样子,做出个性,仅仅根据某种规则行事,譬如根据某种理论或逻辑法则行事是无济于事的。根本的是要营造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里,主体对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好的学问,好的文章,好的刊物是主体心血外流的结晶,是主体生命的□放。我非常赞赏凡讲到干事业,做学问首先强调做人的见解;我非常欣赏一付古老的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这种生存状态里文化素养是它的灵魂。文化素养中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这种神秘的东西我们平常称它为悟性、灵感,这是一种在康德看来只有上帝才具有的“知的直觉”,创造性与它分不开,目前对于这种神秘因素的研究还极为不够,看来,没有对现有科学的根本性的突破,这种研究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但是实践证明,这种“上帝才具有”的“知的直觉”人也是可以获取的,爱因斯坦就是有了。

“精神四达并流”

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精神非常自由,具有巨大的创造力。

庄子主张人要心灵自由(庄子自述:“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尼采主张人要“精神自由”。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的特征便是这种心灵的或精神的自由。人的最大自由正在于此,人最重要的解放也在于此。世界上什么最大?宇宙。什么最活?也是宇宙。宇宙囊括了一切运动着的物质。造物主特别恩赐于人类,给每一个人安了一个头脑,头脑的主要功能是思维,而思维可以与整个宇宙相对应,思维活动的速度和领域

是无限的，于是，人便成了万物之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头脑又极易被什么所封闭，经验、知识、理论，甚至于别人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所知障”。在被严重封闭的心灵里是一片黑暗的、死寂的世界。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使人失去了最大的自由，是人生之大悲，不过许多人习以为常不能察觉而已，在这种心灵里没有创造的阳光照耀，没有源头活水流淌，自然也就没有创造之花开放。我们学人、编辑首先要把各种各样的“所知障”搬掉，让“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庄子《齐物篇》），让创造的洪水奔涌而出，“精神四达并流”（庄子《齐物篇》），创造一个不断创新的、美妙无比的精神世界。这种人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被称之为“哲学家”，在17世纪法国思想家卡斯帕尔那里被称之为“有教养的人”。哲学家有两种，一种是著书立说的专业哲学家，一种是非专业的、被称之为存在的、投入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从生命中、事业中体现出来的，爱因斯坦就是这类哲学家的杰出代表。各门学科、各种领域都可能涌现出这类哲学家，而且他们之间是极容易沟通的。这种人我叫他“通”了的人，是最有创造才能的。高校学报研究的专业很多，即使一种专业亦往往需要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主编很难精通所涉及到的所有专业和学科，他应当大致了解这些领域里的科研进展情况，更应当是个“存在的”哲学家。编辑工作需要一些工作方法，这主要是操作层次的方法，现成的创造方法是没的。主编只要成为“存在的”哲学家，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幻出无穷无尽的创造性的方法来。“通”不能代替专业训练，但是它可以打开我们的“天目”，使你看到不“通”的人看不到的广阔世界，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幸 福

对于编学术刊物，我有一种冲动，工作形成惯性，大年初一也难以停下来。1986年我刚调学院新闻所主编《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的时候，为了建立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实体，我四处奔走呼号，竟因此昏了过去。有生以来我一共发生过两次昏厥，另一次是岳母进京治癌的时候，也是因为太累。后来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领导多次想调动我的工作，新岗位条

· 12 ·

件还较舒服,但是我终究不能离开那本刊物。1989年底,上级决定将《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合并到《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我着实地哭了两场。文化学家发现,人的造物反过来制约人自身。学术刊物是我做成的茧,于是,我做茧自缚。我已经在这个茧壳里呆了七年多了,在里面做着美梦,梦到的还是一个茧,一个大一些漂亮一些的茧。梦,至今未归。我想一直这样呆在里面,直到一只钳子破茧而入把我从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夹出来那一天为止。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故”。

韦伯说:“任何人如果不能”“认定他的灵魂取决于能否在这段草稿中做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点好些……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你就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每次刊物印出来,我总是急于见到它的模样,虽然已经参加了多次校对,但总还要一张一张翻开来瞧瞧。有一次我忽然发现那时我的心情有点象我第一次进产房看自己刚出世的孩子时的心情。至于写完了一篇文章的陶醉感更是经常的伴随着我,我相信我在文稿里的那些观点是大致可以成立的,是有点价值的。如上所述,我有时写稿不用起草,一遍写成;但有时又感到十分吃力,多次修改而不满意。问题在于我读书太少,力不从心。我常常感到自己志大才疏,腹内空虚,笔下无力。我习惯于站在最高处去观察,去思考,但是又行之不远。我经常处在好高骛远的遐想之中。我具有孩子般的幻想也具有孩子般的幼稚。我经历了不少的屈辱和磨难,但是它终究没有把我从文字(写、编、读)圈里挤走。矛盾袭来,我甚至于不愿意花时间去想想如何处置,事到临头往往不知如何处置好。我的研究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似乎离它越来越近,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又觉得离它越来越远,我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异类。理解我的日渐减少,许多人说我太傻,我还感到有些人拿我开心。我不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这确确实实是我一大弱点,而且很难改正。

一位只有一面之交的书法家给我写了一幅对联曰:“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看来命中注定。前天早上一位退休的总编辑说我是唐吉珂德。过奖。唐吉珂德一生都在反抗时髦,追求真理,从未妥协,别

无他务，连爱因斯坦都对他十分崇敬，与他老人家相比，我只能是自惭形秽。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物质享受，精神价值被抛到九霄云外，波兰思想家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把这种价值观叫做“工业价值观。”我相信，人的本质就在于追求也许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存意义；我发现，发达国家日前正在超越“工业价值观”走向对生存意义的追求；我感到，人类正处在一次关于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调整自己与自然关系的大革命的前夜，人类的出路全系于这次革命的成功，而它的成功又必须主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智慧星指用最好的办法去追求最崇高的目标”（〈英〉哈奇森）。而“获得智慧，寻求真理，并使心灵美好，远比追求金钱、荣誉和名声好得多。”（〈古希腊〉苏格拉底）学问、刊物蕴藏着属于我们的幸福，这需要我们专心致志地去发掘，需要我们自己精神上的升华。前两天从一位青年朋友那里看到了他写的一首诗，很象是写给我的，于是我便和了一首，现将原诗和和诗抄在下面，权作本文结尾。

原文：正 直

不会左右迂迴
你就划不出优美的圆
不会上窜下跳
你就翻不过陡峭的山

只消一句话
你可以道破古往今来的秘密
却是千言万语
说不出自己脚下的辛酸

你的路最长
尽管你的距离最短

和诗：邪门儿

有了朝阳夕月
你会欣赏到优美的圆
有了凌云之志
何愁飞不上碧蓝的天

只消一句话
魔鬼说过现代人几乎全无灵魂*
却是千言万语
说不尽精神世界的灿烂

你的路最长
苦恋的道路不应最短

（原作写于1993年8月，改成序文于1994年3月19日）

* 30年代钱锺书著《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魔鬼说，到了19世纪中叶人类几乎全无灵魂。随着“工业价值观”的发展，现代更是如此。

文化传播研究

目 录

自序:大梦未归

文化传播研究

现代文化批判与新现代化道路..... 1

我们将化为“泡沫”

——信息高速公路将给
传播业带来什么? 23

广告:一条必须扎结的血管..... 36

论“全息文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文化选择..... 42

大众文化引导论 57

层次拉开与互相开放 73

秘密武器的发现与二次浪潮的掀起 ...
..... 78

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
传播学道路 83

关于“以受众为中心”观念的讨论 ... 97

评奖制度应大改.....101

新闻的性质与神圣的境界.....103